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

北京出版社

谈《春蚕》

——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

《新女性》个性解放道路的终结

——论陈白露的悲剧

郁达夫与卢梭

语象美

——绘画美

——流动美

——戴克家予青诗的形象构成

吴组缃

马俊山

彭晓丰

封面设计：慈向群

38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四年 第4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北 京 出 版 社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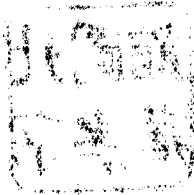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3125印张 370,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920

书号：10071·578 定价：1.90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目录

一九八四年第四辑(总第二十一辑)

茅盾研究	谈《春蚕》 ——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吴组缃 (1) 茅盾儿童小说初探……………金燕玉 (26) 茅盾早期思想研究中若干问题商兑……………丁柏铨 (38) 评苏、德、日、捷等译本序跋对《子夜》的评价……………李 岫 (55)
巴金研究	巴金短篇小说的抒情特色……………杜秀华 (72) 论巴金小说的抒情艺术……………袁振声 (84)
现代文学史 专题研究	“新女性”个性解放道路的终结 ——论陈白露的悲剧……………马俊山 (101) 创造社与中国现代话剧……………刘 珏 (122)✓ 对萧军及其《文化报》批判的再认识……………铁 峰 (142)✓
小说创作 与小说家	论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家族……………彭定安 (158) 郁达夫与卢梭……………彭晓丰 (180)✓ 论叶圣陶文学风格的成因……………曹惠民 (203) 论许地山的后期创作……………宋益乔 (221) 试论《骆驼祥子》的语言艺术……………许 卫 (241) 论《淘金记》的语言艺术……………左 人 (264)

诗	与	语象美——绘画美——流动美	
诗	人	——臧克家抒情诗的形象构成……吕家乡 (272)	
		热情的追求, 执著的探索	
		——论林庚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理论	
		思考……郭小聪 (284)	
		论郁达夫的旧体诗……王冠军 (296)	
戏剧创作		论吴祖光早期的戏剧创作……宁殿弼 (305)	
争	鸣	来自日本的影响?	
园	地	——与吕效平、武锁宁商榷……徐 学 (320)	
资	料	萧军谈《八月的乡村》……谷兴云记录整理 (327)	
		《八月的乡村》漫笔……谷兴云 (329)	
		新发现的丁玲一封佚信……姚明强 (338)	
作家传记		“海棠香国”出骄子	
片	断	——《郭沫若传》第一章……龚济民 方仁念 (341)	
中国现代		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验和成就	
文学研究		……柳无忌著 叶雪芬译 张镜潭校 (360)	
在 国 外			
读	者	札记七则 ……李 郁 (71,	
		100, 202, 304, 326, 340, 359)	
作	者	来信摘编…… (157, 383)	
编	者	编后记…… (382)	
		由衷的话……王 瑶等 (384)	
		鸣 谢……北京出版社 (385)	
		启 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 (385)	
		一九八四年总目录…… (386)	

谈《春蚕》

——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

吴组缃

一

茅盾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所写的《子夜·后记》里说：“我的原定计划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九三〇年的《新儒林外史》，——我本来都打算连锁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之内；又如书中已经描写到的几个小结构，本也打算还要发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本书就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又说：“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脱稿；其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事，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计亦有八个月之多”。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所写的《春蚕·跋》里说：“右《春蚕》等七篇写于去年二月至今年一月。”《春蚕》这本书共收集了《春蚕》、《秋收》、《林家铺子》等七篇作品。看其内容，七篇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子夜》的题材中分割出来，单独成篇的。《林家铺子》篇末注明写成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春蚕》篇末注明写成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可见它们是在停写《子夜》的八个月期间写成的。由上可知，《春蚕》中的这些作品不论从主题或写作年月看，都与《子夜》有很密切的关系。《春蚕》之后是《秋收》和《残冬》（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这三篇是相连续的姊妹篇，或称“农村三部曲”。

《春蚕》写蚕事的失败，从蚕丝业的萧条而引起的农村破产；《秋收》写农民在饥荒中的吃大户斗争；《残冬》写农民生计完全绝望以后，终于走向自发性的武装斗争。三篇中背景及人物都相同，而人物到后两篇才达到最充分完整的发展。《林家铺子》是写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与《春蚕》等三篇都是《子夜》题材中“割弃”出来者。茅盾的小说与《子夜》题材同一系统的很多，除上述几篇外，还有短篇《右第二章》、《小巫》，中篇《多角关系》等。在一个主题、一个中心思想之下，写成长篇、中篇、短篇各种小说，这种写法不是自茅盾开始。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都是这种写法。我国史传文学中也不乏这样的写法，司马迁的《史记》（他在《项羽本纪》里写到刘邦，在《高祖本纪》里又写到项羽）就是一例。

在写农村的三篇中，以《春蚕》最为完整。所以我们把《春蚕》作为代表作，较全面地加以阐论，以见一般的特色。

上述这一系列的作品，主题是同一的，或者说是彼此密切关连着的，因为它们是从一个整体中分割出来的。作者企图通过这些作品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作大规模的全面分析，从而指出社会发展及革命斗争的方向。在这总的主题之下，就中国都市——主要以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族工业来作分析的，是《子夜》；就中国农村——中国农民来作分析的，是《春蚕》等篇；就中国市镇——商人及小市镇居民来作分析的，是《林家铺子》。我们在论述各篇具体内容之先，有必要简略地一摆各篇所共有的时代背景：

第一，一九二九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经济恐慌，垄断资本家的资本没有出路，到处兴风作浪。那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到中国来寻求出路。一九三〇年此毒遂涌入中国都市。其后日见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由于金融资本的倾注，投机买卖和交易所大兴。一九三〇年五金工业中

的外资增加到百分之九十，纺织业中的外资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同时，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也陷于停顿。二是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廉价商品，如美国的棉花和面粉，日本的人造丝等。结果使中国民族工业濒于破产；工人被剥削得难于生活，工人运动因而日趋高涨；农村被剥削掠夺，普遍破产；集镇商业大量倒闭，许多人甚至到乡下盗棺或作收银子买卖。

第二，由于各帝国主义内部的经济恐慌，他们彼此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尖锐化。日本帝国主义自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就定下侵略中国的计划，即所谓“大陆政策”。但当时由于英美法德各帝国主义的竞争牵制，不能畅所欲为。而这时，一方面由于日本自身的经济恐慌，急需挽救；另一方面由于英美等国忙于本国的严重问题，无暇与日本争霸中国，因此日本乘机转入对中国大规模的军事侵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侵占我国东北，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进攻上海，一九三三年侵占热河、察哈尔，以后又占冀东，直至“七·七”事变，中国部分地区沦为殖民地。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上又兼有了殖民地性。

第三，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背叛了革命，完全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且依赖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进行内战：一方面是南北之间的军阀混战，一方面是反动派对工农红军的疯狂进攻，连续进行了五次围剿。内战的结果是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抓兵征粮急如星火。农民们除受蒋介石政权的压迫及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以外，更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土地大量兼并，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又加上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连续两年的大旱灾和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灾，农村经济完全陷于破产。

第四，革命阵营内部，在毛泽东思想没有居于领导地位以前，当时曾有过多次错误路线。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批判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之后，一九三〇年又出现了立三路线。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之后，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中国革命仍处在低潮时期。

第五，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反动学者大肆嚣张，一般知识分子思想动摇，在广大国统区内，形成极其混乱的局面。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就是这种混乱的一种表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各派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种种不同的分析和认识，这个问题密切关连着中国革命方向和路线的问题。当时的几种反动说法是：第一种，托派陈独秀分子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由资产阶级的胜利而终结，资产阶级已经建立了它的统治。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放弃革命斗争，转入合法运动，以待将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可以正常地发展它的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表面上好象是机械地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则是向官僚买办的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投降。第二种，蒋介石政权的御用学者及政客们说，在现有的社会机构上应当积极发展国家资本。只有走这条路，中国才能得救。这是欺骗地抹煞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中国从来就受着帝国主义经济及政治的侵略和压迫，此时尤其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中国的所谓国家资本是什么呢？首先是豪门资本，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国家银行是他们的，中纺等大工厂也是他们的。其次，他们幻想利用外资以发展国家资本，这实际就是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就是作买办。所谓国家，实际就是这样的官僚与买办，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统一政权。还有一种是书呆子的幻想。这些人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不良，所以经济落后，不能和国际资本竞争。只有政治安定，内战停止，工商业及农业才能正常发展。这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替帝国主义说教。中国的政治不安定，正反映了帝国主义的角逐

与竞争，也反映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起来镇压人民革命。帝国主义不打倒，政治如何能“良”呢？即使内战停止了，也不过是为国际过剩商品及资本提供了安全投资、安全倾销的场所。

上述五点正是茅盾《春蚕》、《子夜》等一系列小说写作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明了这一背景，才能深入理解《春蚕》、《子夜》等小说的思想内容与主题。

二

《春蚕》与《子夜》的主题有密切的联系。

在《子夜》中，作者企图要大规模地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无非是都市、农村、小市镇（即工业、农业、商业）三方面。从这三方面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情况，而中国社会性质也可以从中得到说明。作者以上海的社会为典型，以写中国民族工业为主，明确指出中国社会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势力侵略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在军阀与官僚买办政权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没有出路。小说以主要中心人物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典型，通过他与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斗法失败，具体表现了中国民族工业如何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控制，成为金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家的奴隶与附庸。从吴荪甫这个有魄力有才干的民族资本家的惨败，使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得到了一个明确而合理的解答，从而中国革命的方向及革命性质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答案就是：第一，必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政权，而当时主要的是反帝。第二，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民主革命。这基本上是符合毛主席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当时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尚未居于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正处在最艰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茅盾的《子夜》所概括的主

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春蚕》所描写的是破产中的农村生活，正是《子夜》企图表现而未尽兴的一个方面。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国家过剩商品的倾销和金融资本的掠夺，摧毁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其中包括日美人造丝的倾销，使丝厂纷纷倒闭）；日本帝国主义更在这时乘机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而蒋介石政权却对外投降、对内高压，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发动南北战争与对工农红军的进攻，配合了帝国主义经济军事的侵略行动；这就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中国农村经济完全破产，使农民走入空前未有的悲惨厄运。《春蚕》主要就是分析这一方面。它通过农民的主要副业养蚕这一事件，来具体表现中国农村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贫困落后和陷于完全破产的惨状，指明我国农民在此走投无路的处境之下，必须甩开一切传统的落后思想，认清新的现实，团结一致，奋起向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和一切统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图自存，否则唯有死路一条。

作者借着养蚕这件事，来表现两方面：一是从养蚕这件事，表现当时中国农村的悲惨遭遇与走投无路的处境。二是表现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所造成的落后意识形态，即农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父子两代思想认识的不同与矛盾。在此层层对比中，着重点是在批判居于农村领导地位和家长地位的老一代落后的传统思想，同时又肯定比较进步的青年一代的农民，指出唯有青年一代才有希望，才能担当起历史所赋与的任务。这是一个主题的两方面，不是说有两个主题。这两方面互相糅合，不可分割。中国农村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军阀、官僚、买办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农村的生产，任你有多好的天时条件，任你花费多大的气力，都不能挽回悲惨的厄运。可是中国农民万万不能安于这悲惨的厄运，听候侵略者统治者的宰割，而应该奋起向自己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才能求得生路。但农民

的思想认识如何？他们的觉悟如何？是否能够担当这个严重迫切的历史任务呢？于是作者通过全部养蚕过程深入而细致地分析了这些问题，说明农村意识形态一般是这样落后，尤其是老一代农民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但比较起来，年青一代却是有希望的，他们的思想看法是比较对的。当前的切身的事实教训就证明着，年青一代的思想认识虽不透彻，却基本是进步的，他们正在为寻找自己的生路而奋起斗争。作者在这里通过人物性格的批判与肯定，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倾向性。茅盾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抓住主题紧紧不放，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加深描写他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这一篇还是属于《子夜》的主题范围，它具体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从而指出了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方向。

三

《春蚕》里人物很多，有老通宝、阿四、阿四嫂、多多头、荷花、李根生、六宝、陆福庆、张财发、黄道士、小宝，共十一人。除张财发是从镇上来的以外，其余都是被压迫、有着同样命运、处于同样环境中的农民。《春蚕》中没有提到一个非农民的农村中人物，如地主之类。地主都跑到上海或镇上去了。甚至于富农也似乎没有。因为在新的现实中，他们的处境和遭遇是与农民不同的。农民当走的路，他们是不会走的。

在这篇小说中，李根生、陆福庆这两个贫农都没有什么交代（陆福庆后来在《秋收》中与阿多共同领导农民吃大户，在《残冬》中也是领袖）。对黄道士、张财发也没有着重地介绍他们的思想性格。小宝年龄太小，所以也没有资格来显示他的思想（在《秋收》、《残冬》中已不同）。剩下的就是老通宝、阿四夫妇、多多头、荷花、六宝。这六个人，可以分作三大类：老年的，老通宝；中年的，阿四夫妇；年青的，阿多、荷花与六宝。

《春蚕》主要以老通宝一家为中心，把老通宝一家作为农民家

庭的典型。在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家庭就是生产单位。因此老通宝一家，父子三代，三类不同的思想性格，就可以全面概括中国的农家，概括中国的农村。这是小说人物的主要中心。荷花与六宝是从属的，为补足与陪衬这一家三类不同思想性格的关系和影响而安排的。

这三类人物，作者显然是以老通宝为主。这是有意义的。因为年老的一代，在当时居于家长地位和领导地位。老通宝的思想，正是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一整套的传统思想。他的思想的主要方面，首先是顽固守旧，禁锢于过去的经验，而昧于时势。自私自利，眼光如豆，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对家庭专制，轻视青年，蔑视女性。并且极端排外，一切外洋的东西（如洋蚕种等）都要加以仇视。其次是奴隶意识，勤劳节俭，苦做苦干，安分守己，不作非分之想，依赖仰仗统治压迫阶级。再次是根深蒂固的宿命论和神道观念的思想，深入骨髓的迷信与禁忌，满心的疙瘩。这三方面，本质是一个，其要点在于完全为统治势力所慑服（所谓统治势力就是指地主、官府、神道与命运），从来不相信自己有任何力量，于是安于自己的奴隶命运。被剥削、被敲骨吸髓，以至忍饥挨饿、活不下去，还是顽固地维持与保护那旧有的为统治者压迫者所安排的秩序与手段，不许改变现状，永远要在老一套秩序与制度里挨下去、拖下去，苟延残喘。

这一整套传统守旧思想，在农民中所以形成，而且在封建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数千年停滞不变，反映到政治上也就不变。当然有改朝换代，但是倒了一个专制皇帝，再来的还是一个专制的宰割百姓的王朝，即所谓以暴易暴。被压迫者活不下去时，就要暴动，改朝换代多是农民的力量。但农民又总是被野心者所利用，作了他们的工具，从来没有得到什么自己的利益，所得的只是连续的血的教

训。由于经济基础不变，生产方式不变，老一套的生产经验是可贵的，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由于政权本质不变，老年人的一套世故，明哲保身、苟且偷生的哲学，安于作奴隶顺民的思想也就自然成为权威思想。但是一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这个古老的社会基础动摇起来了。可是虽然动摇，却未根本改变和被摧毁，尤其是在农村里。因此象老通宝这样的传统思想，虽在客观上渐次失其权威，连阿四嫂也不相信他了（如本篇中关于洋蚕种问题，《秋收》中关于肥田粉问题），但因其基础未变，且又根深蒂固，所以仍然顽强地居于领导与权威的地位。等到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转入新阶段，发展为更残酷的掠夺时，国内统治者完全投入帝国主义怀抱，从而农村的最后一滴血也被喝干，农民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这现实就与过去任何时候不同了。老通宝的一套就迫于形势完全垮台。从前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变成“若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在《春蚕》里，老通宝不过病了一场，并没死。这个病也可以说是一场思想斗争，是老一套的求生方法与新的现实的斗争与矛盾。到了《秋收》，再碰一个钉子，他就死了。临死时，他的眼睛看着多多头，似乎说：“真想不到你是对的！真奇怪！”这样，不但老通宝死了，老通宝的思想也死了，再也传不下去了。作者不但在洋蚕种问题及整个的养蚕计划上，用具体事实批判了老通宝的思想，而且在全部养蚕过程的每一环节、每一措施上，也详尽细致地揭穿与批判了老通宝的思想。

鲁迅所写的阿Q所处的时代比老通宝的时代要早二、三十年，他们虽然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在相似中却又有着显然的根本的不同。阿Q比老通宝进步。阿Q要求变革现状，要求参加革命。而老通宝不然。他死心踏地地靠向统治者一边，顽固地遵守旧有的秩序，维护旧有的制度。这是什么原因呢？作者的现实主义眼光，绝不会放过这点的。在小说一开篇，作者就写出了老通宝的思想根源，写出了他为什么这样顽固守旧、死抱着奴隶思想

不放和坚守旧秩序。作者写出他家有二十多亩稻田，十多亩桑地，还有三开两进的一座平房。这些财产都是十年间挣起来的，而且为东村庄上人人所羡慕妒忌。单凭这个，就知道他是个中农，而且是个上升的中农。他家的兴败，与没落地主兼商人的陈老爷家同一命运。老通宝总是不忘自己祖父辈的一段光荣历史，因此他是那样看太平军的革命，那样相信自己在上层有面子，并且看不起荷花他们。当然，他的经济地位已因帝国主义侵略等原因而日见下降，到了《春蚕》中，实际已没有了那二十多亩地，并且还欠了三百元债，已成为贫农了。但他原有的上升的中农意识却仍然保持着。他还要向上爬，还要借债来大量养蚕，凭着过去的经验，凭着家中几个很强的劳动力，来挽回失去的好光景。作者着重交代了这一些中农的向上爬的自发性的资本主义思想。这些是和他们整套保守思想分不开的。若忽略这些，那老通宝的一整套思想就没了根。若问作者为什么不选取象阿Q那样的贫雇农，如作品中荷花的老丈夫李根生，六宝的哥哥陆福庆来作为主要中心人物呢？为什么不写李家或陆家的养蚕事件呢？这是《春蚕》的主题所决定的。因为象陆、李这样人家，早就一贫如洗了，新的形势、新的农村破产的现实所造成的影响，对他们来说，就远不如老通宝家所遭受的更为显著突出和深刻重大。《子夜》中为何用吴荪甫为主人翁，而不以朱吟秋、杜竹斋、冯云卿、陈和甫、朱仲伟等为主人翁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鲁迅写阿Q，写《离婚》中的农民时，主观上未必有阶级分析的观点，但茅盾写《春蚕》就不同了，他是显著地力图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了。

作者抓住每个养蚕过程的环节，描写分析老通宝的思想性格，同时又予以讽刺和批判。这是本篇中处理人物的重要一面。在否定老通宝思想的同时，作者又抓住主要环节，用层层对比的手法，来描写下一代的思想，指出农民思想并不都是象老通宝这

样。老通宝的思想是即将死亡的思想，还有新的思想在新的现实中成长，并与老一代对抗，将取老一代思想而代之，以见出在急剧变化的现实中农民思想意识的斗争与矛盾。这就是于否定的同时，又有所肯定，指出农村社会中新的一面，能于死中求生的一面。老是一味地批判与否定旧的和行将死亡的，那是批判现实主义。茅盾不是这样。他超过了批判现实主义而进到了新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范畴。

阿四夫妇的思想有些地方显然与老通宝不同。阿四嫂坚决主张用洋蚕种（《秋收》中她主张用肥田粉，而老通宝却要用豆饼）。对于大规模借债养蚕，阿四夫妇也不同意。阿四嫂对老通宝将所借的三十元钱全买了桑叶，而一家人忍饥挨饿，就常常发生口角。蚕茧卖不出去，老通宝要缫丝，阿四夫妇就问你那有这么大力量？这该花多少钱？这些对处理实际生产的意见，都显得比老通宝灵活、进步，不象老通宝那样顽固守旧。在对旧秩序旧制度的态度上，显然也有程度上的不同。当然，这个不同并不是本质上的，阿四夫妇并不否定劳动发家，也不要求改革现实。所以说阿四夫妇在思想上还是接受了老通宝的许多思想传统，如神道观念及宿命论思想等等。

与老通宝迥乎不同，成为鲜明对比的是阿多。作者在否定老通宝时，总是用具体事实来肯定阿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上：第一，阿多健壮、乐观，浑身充满了朝气与活力，不象老通宝那样被现实压迫垮了，一点生气也没有，只是发愁。阿多在溪边一出现，头顶着五六只湿“团扁”，双手划桨似地走，就给人很深的印象。第二，没有迷信观念与宿命论思想。因此他坦坦荡荡，毫无顾忌，绝不象老通宝那样满心疙瘩。第三，不鄙视荷花，反倒十分同情她，甚至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她。荷花半夜去抓老通家的蚕丢在河里，这是破坏行动，但阿多放过了她。这与老通宝的态度有根本的不同。老通宝嫌弃荷花是白虎星，怕被冲煞，不许家

人与她来往。这不只是迷信思想，也不完全是出于封建礼教观念，嫌她不规矩，喜欢和男人打闹等等；最根本的还是阶级意识引起的阶级歧视。他看不起穷人，看不起比自己阶级地位低的人。若是陈老爷家的妇女，必定不会嫌其不规矩，也不嫌其白虎星冲煞了。第四，最要紧的是他们的眼光识见都不同。对老通宝的种种唠叨，阿多只是暗笑。他知道即使今年蚕花好，也不能因此发财。他永远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田里稻熟，就可以还清债，再有自己的田（而还债买田正是老通宝恢复家业的中农意识）。他知道单靠勤俭劳动，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这一点认识最重要。他后来领导吃大户及暴动，都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这种思想说明什么呢？它说明阿多从感性上认识到现实社会是剥削奴役劳动人民的，他不能顺从这样的社会秩序，他要求变革，虽然他还说不出所以然来。他比阿四夫妇要进步得多，甚至有根本的不同。这不只表现在对迷信观念的态度上，也表现在对现实的看法与态度上。这种不同更明显地表现在《秋收》里：阿四借来三斗米，被吃大户的农民拿去吃了。阿四为此大哭大闹了一场，而阿多却正是这些吃大户的农民的领袖。

阿多的进步思想哪里来的？一般说来，转形期间的社会天天在变，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却可以残留一个长时期。因为意识形态由社会经济基础而产生，但产生之后，又保有其一定的独立性，反过来起积极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素朴的说法叫做“先入之见”，这是有巨大力量的。一般的普通人，年岁愈大，旧社会经历多，“先入之见”就愈多，愈不能实事求是地来看急剧变化中的新现实（当然，观点方法对，就会冲破年龄的限制）。而年青人就没有那些成见来遮蔽他的眼睛，这是不必细说的。在社会转形期间，父子两代的冲突是普遍的，成为规律性的现象。老通宝的家庭此时正处于阶级地位转化的时期，即由中农转化为贫农，则其父子间的矛盾，更加反映了阶级意识的矛盾。阿多的要

求改革，要求革命，正是贫雇农的意识，因为他的生活地位实际是贫农的了。他的要求与阿Q是相同的，只是时代不同罢了。

荷花与六宝都是为了陪衬，为了表现老通宝与阿多而写的。从这里主要反映了两点：一是不团结的关系，一是男女关系。荷花是个年轻妇女，嫁给（也可以说是卖给）老头子李根生，被社会压迫污辱和损害歧视，她是天然有反抗性的。但她的反抗表现得很落后，即是为了报复。“你们不把我当人看待！”这是她的怒号。她穷得养不起蚕，没办法，拿来倒掉。这是可悲可惨的。可是别人不但不同情她，反而轻视她。她在那种社会里不被人当人看，只有阿多把她当人看，因此她对阿多表示好感，甚至有似乎是单方面的爱情，这是很可理解、很可同情、也很自然的。六宝的家庭也是贫苦的。《春蚕》中写她家没养多少蚕，帮阿多家捋叶；《秋收》中她家的穷困就更明白了。阿多跟六宝好，老通宝不愿意，认为阿多不老成，十分痛恨。当然这主要是指阿多对荷花的态度，但也包括六宝。若六宝是陈老爷家的小姐，恐怕老通宝就会很愿意了。另外，六宝因为阿多，对荷花有意见，她们也不团结。年青一代的男女关系，包括荷花的喜欢和男人胡调，阿多与六宝的调情，一方面固然是落后的，一方面又是有进步意义的。它既表现了对封建秩序的反抗，也表现了年青一代的新的生活精神。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见出人物描写所表现的主题的一面：即在那种处境与遭遇中，原来居于社会领导地位的老一代思想已在死亡，为新的现实所否定；而新一代是有生气、有力量、有新认识的。社会在发生急剧变化，老通宝家庭的阶级地位在转换，年轻的一代正在要求变革，开始寻求新的生路。

四

一般地说，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有生活，从生活中择取题材，加以分析研究，提高加工，而后获得主